

“七千人大会”的主要历史成果

任全才

为统一全党认识,加强团结,加强民主集中制,进一步鼓舞干劲,战胜困难,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在北京组织召开了有中央局、中央各部门、省地县及重要厂矿企业和军队领导干部,一共七千多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

一、正确估计形势,初步总结了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

七千人大会是我们党自己纠正“大跃进”错误的一次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对于认识工作中的错误,总结经验教训,动员和组织全党进一步贯彻“八字”方针,克服经济困难,起了重要的作用。

首先,正确估计了当时的形势。当时党内对经济形势存在着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困难严重,有的问题还在发展;另一种认为困难已经过去,经济已经开始回升,情况开始好转。为了统一认识,周恩来总理用大量的事实和统计数据说明当时经济生活中的困难:农业生产还没有恢复起来,农业生产水平供养不了这么多城市人口和职工;工业生产任务用不了这么多职工;文教科学事业的规模同经济水平不完全相适应;机关、企业、事业单位过多,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工作重复,有许多无效劳动;我们搞了一年多的调整,困难

还不能一下子完全克服。他特别强调,要充分估计困难,目的是为了找办法去战胜它。经过会议的热烈讨论,在原则上肯定形势大好的情况下,认为困难还是非常严重的。这个思想得到了到会同志的拥护。

其次,对1958年以来经济工作的成绩、错误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认为1958年以来取得了伟大成绩,归纳为12条。关于错误问题,有人认为这几年的错误是片面强调总路线的灵魂是搞速度,违反了有计划按比例客观经济规律;以钢为纲,挤掉了其它;人民公社超过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搞了平均主义、共产风;只反右不反左等。刘少奇同志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归纳为: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战线太长,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关系发生了严重的不协调;在人民公社的工作中,一个时期内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对集体所有制内部关系进行不适当的过多过急的变动,违反了按劳分配、等价交换原则;在手工业方面急于把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不适当地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几个完整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倾向严重滋长;对农业生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因而使城市人口不适当的大量增加,加重了城市供应的困难,同时也加重了农业生产的困难。少奇在

报告中明确指出,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应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这就突破了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公式,对各地领导干部正确分析认识本地区的情况起了积极作用。

对于造成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原因,有同志对“造成困难的原因一是天灾,二是苏修逼债,三是工作中的缺点”提出了疑问。刘少奇在会上明确指出:一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了产;二是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这两个原因各地情况不一样,有些地方主要原因是天灾,有的地方减产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全国来讲,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工作上和作风上的错误引起的。他借用湖南农民讲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话比较公道,受到了参会同志的拥护。这样认识,对于使全党从主观上认识工作缺点错误起了积极作用。

再次,对党的工作中发生的错误原因及责任的认识比较正确。经过大会热烈讨论,普遍认为这几年党的工作中发生错误的原因有三条:①确实有个缺乏经验问题,比如58年上半年形势很好,大家急于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轻易相信高产量,放卫星的经验;②党内不少领导同志骄傲自满,违背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③削弱了党内民主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这个分析不仅是实事求是的,而且击中了要害,原则上找到了犯错误的原因。对工作中发生错误的责任,从中央开始各级领导都有一定的责任。少奇同志指出,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其次是省、市、区一级党委,再次才是地县。中央、中央各部门、国务院和

国务院所属各部委发出了一些不适当的指示、文件和口号。毛主席在讲话中说到: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地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邓小平从国务院工作角度承担了责任。由于中央领导带头承担了责任,各级领导也主动承担责任。原来有怨气的同志也讲不全怪中央,事情还是我们下面干的。大家认为这样讲比较公平,听了后心情比较舒畅。

最后,在理论上作了初步总结。这主要反映在刘少奇的报告中。主要的经验教训:①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所提出的多快好省几个方面是相互制约的;②以农业为基础发展国民经济是我国的一个根本方针;③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不能混淆的;④全民所有制在我国现有各种所有制中居领导地位;⑤社会主义经济要有统一计划,计划指标必须符合实际,要留有余地;⑥文教科学事业的发展必须同经济建设的发展相适应;⑦把国家计划的统一性和地方的积极性结合起来;⑧民主集中制是人民内部实行的一个制度;⑨必须充分发展商品经济、商品交换,加强和改进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工农业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⑩社会主义不是平均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等价交换;⑪爱护群众,把群众的精力用在适当地方,以取得较大效果;⑫吸取国外经验,争取国际援助;⑬必须长期坚持勤俭建国的方针;⑭国家、企业、事业机构过于庞大,非生产人员过多是阻碍国民经济发展的;⑮必须实行政治和经济、政治和技术的统一;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上述这些经验,今天看来显然是不够的,还有些重要的经验没有总结出来,但是在当

时能够从理论上吸取这些教训也是不简单的。这从政治上、思想上为后来纠正错误奠定了基础。

二、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七千人大会的另一个功绩就是发扬了党内民主,使党内民主生活中某些不正常的情况有较大的改善。

首先实行“三不主义”。周恩来、邓小平在会上强调敞开思想,有啥说啥,保证实行“三不主义”,所以民主空气比较浓。但由于多年来党内过火斗争,使一些同志仍有疑虑。有的同志说,毛主席在会上号召我们当海瑞,我可不敢当啊!没有资本,当了海瑞不仅自己倒霉,老婆孩子也不好过。所以毛泽东于1月29日下午召开出气会,特别强调发扬民主和让人讲话,一是遵守纪律,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二是不组织秘密集团活动。毛泽东的讲话对动员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起了好的作用。在讨论中,大家对党内生活不正常现象提出尖锐批评:近几年以个人名义下达指示,传达个人意见的状况,上下都有;中央有的部门下达一些草案和会议纪要性质的东西,下边不执行要受批评,执行出了问题,又说我这是草案呀!谁叫你执行的,也受批评;许多问题的根子在上面,历次政治运动都是整下不整上,所以许多毛病一犯再犯;党的政策是“坐船照镜子——摇摇晃晃”;只批评右倾分子,没有批评一个左倾分子,犯右倾错误的人受处分是应该的,但犯左倾错误的人,似乎就该心安理得,这是不公平的;滥用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公式来压制不同意见,造成下边不敢说真话;有不

少大组建议取消“书记挂帅”的口号。从这些可以看出,会议对党内生活不正常的状况的冲击是比较有力的,提的意见是尖锐的。

根据党内生活不正常的状况,邓小平、陈云、罗瑞卿也发表了尖锐意见。邓小平指出:我们党的民主集中制有了相当大的削弱,这几年有许多事情形式上似乎比过去民主,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分散主义的现象却很严重;有许多事情形式上比过去民主,但是,实际上命令主义,少数人和个人犯独断专横的现象却是十分严重的。他还指出:我党的各级领导人,特别是我们的班长、副班长要团结多数,尊重少数,领导人的度(肚)要大点,要能容人(忍),不能听不得反面意见,要用平等的态度对人,要能谦虚谨慎,要能服从多数,尊重少数。他建议,对我们党的各级领导人应该有监督,最重要的监督来自党委会本身或书记处本身,或者常委本身,并提议把党的主要领导人的小组生活放在党委会去,或者放在书记处去,或者放在常委会去,真正造成一个好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空气。吹牛拍马,看风使舵的人,就是“风马牛”干部。陈云同志说:“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罗瑞卿在军队大组也尖锐提出:对干部绝不能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随便戴帽子,一棍子打死。倒下去的干部可能是好干部,他要求彻底平反,不要留尾巴。不同意见可以保留,党的会议可以批评任何领导人,打击报复任何情况都不许可。

其次,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央领导带头自我批评。毛泽东说:中央犯的错误他也有份,对他的缺点错误不能隐瞒,也作了一些自我批评。刘少奇在大小会议上多次代

表中央作自我批评,并号召对中央、中央各部门和中央不管哪个同志有意见,都要进行批评。特别是周恩来根据当时的形势作了自我批评,对到会同志的教育是深刻的,他的自我批评比较具体。一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在人大常委会上,提出了大跃进的指标;二是1958年他主持起草关于权力下放的文件,(是经中央通过的)由于权力下放过多,造成了严重的分散主义倾向。邓小平除从书记处的角度,承担了责任外,还组织人对中央发的文件进行清理,对书记处工作的缺点错误,给中央政治局写了报告,要求到会同志提出批评意见。

各部委领导也作了自我批评,有的写了书面检查,印发给到会同志。到会同志也不客气,指名道姓提了尖锐的意见。这种广泛而又比较认真的自我批评,达到了“上下通气,一心一德,集中统一,反对分散,克服困难,奋勇前进”的目的。

最后,决定对1958年以来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处理的干部甄别平反。这是发扬党内民主的一个关键问题,也是党内外十分关注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对过去错误处理的干部,不论是全部处理错误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误的,都应该按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平反。邓小平对甄别平反工作作了具体安排,他提出部分错了的部分平反,完全错了的完全平反,平反工作不搞运动,要指定专人,专门机关,专门领导,最好是谁搞错的谁来平反。根据七千人大会的精神,中央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这对发扬党内外民主,团结干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克服困难,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反对分散主义,加强党的集中统一

反对分散主义,加强党的集中统一是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当时认为,1958年以来,党内存在着严重分散主义倾向,这对贯彻“八字”方针是一个极大的阻力。60年代初,分散主义较为严重,有的对中央的指示、方针、政策采取封锁的办法,不传达;有的则采取各取所需。比如中央制定的人民公社60条,有的地区、有的单位就不传达,有的传达是各取所需。有个工厂的党委书记就反对工业70条,说:党委应该有绝对的自由,不能有那么多的限制,如果一定要按70条办事,势必又要翻过去,党委书记下台。由此可见,中央一系列调整措施,遇到极大阻力。因此会议用了五六天时间反对分散主义。会议采取总结经验教训,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办法,号召大家摆表现、谈危害、找原因、想办法,没有伤害同志,效果是好的。

分散主义产生的原因:同国家计划工作和经济管理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关。国家规定的生产任务过高,要求过急,所分配的原料、材料、燃料又不够,使下面不能正确处理全局与局部的关系;党内有的干部严重沾染了本位主义、个人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这些错误,危害是极大的:政治上损害了党的统一;在经济上损害了全民所有制,使国家计划不能正确制定和执行;在思想上滋长了个人主义、本位主义,损害了共产主义;在组织上损害了民主集中制,破坏了党的纪律,削弱了党的战斗力。少奇同志在书面报告中,就如何加强中央对经济调整工作的领导作了十条规定,主要强调必须保证完成国家计划,收回

不适当的权力下放,农产品价格不准随意变动等。这些反分散主义的措施,保证了会后中央采取的经济调整的非常措施能够在全党顺利贯彻执行,没有这一条,调整措施就不可能贯彻执行。

四、为克服困难、恢复经济而斗争

七千人大会总结经验教训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动员全党为克服困难,为恢复国民经济而斗争。

首先是鼓舞信心。当时党内外一些同志对社会主义光明前途产生了怀疑,对克服困难的信心不足,社会上对党是否能够解决严重经济困难持观望态度;党内一些人对党犯严重错误感到不光荣,所以当时有一个鼓舞信心问题。针对这些思想,小平同志从党的本质优点回答了这个问题:有好的指导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有好的党中央,几十年的历史证明了我们党是合格的;有大批好的干部,包括大批新的积极分子;有好的传统、好的作风,这就是实事求是,有理想、有志气,不怕鬼的传统;有好的人民,人民对我们党有最大的信赖。这就极大鼓舞了全党克服困难的信心。

其次是明确任务。克服严重经济困难是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可有的人还想搞“大跃进”,坚持“超英赶美”。他们认为,不能因经济困难,就放弃毛主席提出的“超英赶美”的目标。但这种思想没有得到多数人的响应。刘少奇在报告中提出了十项任务,强调从各个方面加强农业战线,争取多生产粮食、油料、棉花;强调精兵简政,积极压缩城镇人口,精简职工;进一步缩短基本建设战线等。周

恩来同志又具体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办法:坚决精简机构,压缩城镇人口,精减职工人数,减少粮食供应;争取农业增产,主要是争取粮、棉、油增产;增加工业生产,首先是增加能够供应市场的工业品的生产;缩短基本建设战线,该下马的坚决下马;统一、全面、彻底进行清仓查库;反对走后门,大家一起走前门,搞好市场供应,争取财政收支平衡;坚决还清30亿外债,努力承担国防义务(当时欠外债77.300亿元,到61年已还47.7亿元);建立新秩序,树立新风气。这些任务、办法使党进一步制止了大跃进的错误,贯彻了“八字”方针,有了明确的办法,这为后来“西楼会议”所提出的一系列调整措施奠定了基础。

总之,七千人大会的精神在全党传达,有效地动员和组织了全党、全国人民为克服困难而斗争。1962年9、10月国民经济就明显好转,63年国民经济开始回升,64年国民经济全面好转,65年国民经济调整完成;66年上半年,经济建设各条战线开始新的发展。事实说明60年代初我党自觉纠正工作的错误,在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的工作中,七千人大会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段历史我们不可忘记,更不可低估这次会议的历史功绩。当然,这次大会也有它的局限性,对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总结得不彻底,在高级干部中,对经济困难的严重性的认识不统一,甄别平反工作不彻底,象彭德怀等这么重大的问题没有解决。在中央政治局内,对发扬民主没有检查,因此,在党的中央领导核心中,贯彻民主集中制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就成为后来“文革”的原因之一。

(作者系中共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教授)

责任编辑:陈学明